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与公共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术出版物

中国转型期 反经济周期研究

◎ 蒙志鹏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

蒙志鹏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 / 蒙志鹏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017 - 9401 - 0

I. 中… II. 蒙… III. 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870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孙 岩 (电话: 010 - 68359418)

责任印制: 常 毅

封面设计: 高 远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印张: 13.25 字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9401 - 0/F · 8289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与公共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学术出版物 编委会

主 任 刘永佶

委 员 李俊清 张丽君 李克强
杨思远 党秀云

主 编 刘永佶

内容提要

转型以来，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周期性波动，这就要求采取反经济周期来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型期中国的反经济周期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理论发展却十分滞后，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和完善的反经济周期理论体系。

本书全面研究了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问题。首先，从一般经济条件下反经济周期的理论和实践出发，结合转型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情况，建立了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在理论分析框架指导下，探讨了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实践特征和独特现象，分析了影响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层次性因素和特殊影响因素。再次，在对其它转型国家反经济周期进行国际比较和绩效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基本模式及其经验与启示。最后，构建了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操作机制——短期机制和长效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选择：健全宏观经济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反经济周期系统性机制、建立反经济周期绩效评价体系以及反经济周期的层次性战略。

本书的主要探索有：较早地提出了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问题，全面分析了影响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因素，提出了反经济周期的目标模型、量化空间、绩效分析、系统评价以及战略选择等。

总 序

民族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社会存在形式，它从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影响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是民族存在和演化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统一，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中华民族的 56 个支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55 个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居少数的民族，称为“少数民族”。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权利、地位、义务、责任是平等的，都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虽然历史上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中华民族总现代化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劳动者积极主动，取得了飞跃进步。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经济也是经济，具有经济的一般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范畴都适用于对少数民族经济的认识。因为这种一般性，所以出现了对少数民族经济理论研究的质疑：既然少数民族经济也是经济，只要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范畴解决实际问题就够了，何必再对之进行理论研究呢？然而，科学研究并不仅局限于一般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才构成科学的规定。经济学自从形成以来，一直关注着各国、各民族的特殊经济矛盾，所有已经出现的经济学说，实际上都是对特定国度、民族经济矛盾的理论探讨。在特殊经济矛盾的探讨中体现着、包含着经济的一般性。所谓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和范畴，都是某一国家（19 世纪是英国、20 世纪是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学家在探讨其本国、本民族特殊经济矛盾中作出的规定，因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形式上表现为“基本”或“一般”了。中国人知道并应用经济学，是从 20 世纪开始的，由于简单地将某一外国的特殊经济学说当成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忽略了对本国、本民族经济矛盾特殊性的研究，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甚至吃了很大亏。经济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明确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才能从特殊矛盾的探讨中形成适合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的经济学。也只有在中国经济学和中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中才能发现并概括出对经济学基本原理和范畴的新认识。

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济，在一国、一民族的总体中有 56 个支民族，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正视这个特点。不仅要从总体上包括对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还要从少数民族经济自身的特殊性上进行专注研究。这正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之所在。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华民族统一的象征，也是 56 个支民族相融合的学府。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不仅承担着培养经济人才的任务，也肩负对少数民族经济理论和实务研究的责任。“九八五工程”的“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所设的首要课题，就是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经与本校及全国民族（地区）院校同行学者的同心协力，我们从理论、专题、应用、调查四个层次进行探索，所得成果，结丛书出版，请教学界、政界、企业界人士。恭候批评。

劉永信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日

序 一

经济周期和反经济周期调控是现代经济生活中各国无可回避的共性问题。同时，反周期的调控，又必然因不同的国家而具有不同的个性。

自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过渡的转轨之路。市场取向改革，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活力，也使人们原不愿面对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以其更具“自然节律”特点的形式愈益清楚地表现出来，一再冲击着中国发展中并不稳定的国民经济。经济周期和反经济周期研究成为一个转型经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纵观 30 年的发展之路，不难看出，我国转型经济的周期波动呈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这当然关联于我国国情和转型经济特征。为了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向市场经济平稳转型，必须利用反经济周期政策去削弱或冲抵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我国政府转变经济职能、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当前，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从反经济周

期角度研究应对危机和促进改革与发展的办法，则更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蒙志鹏同志长期关注经济周期与反经济周期问题。近年，他在繁忙工作中坚持深化理论研究，在财政部科研所博士后流动站深造期间，自加压力，潜心攻读，将经济社会转型与反周期结合起来作系统性的研讨。《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一书的出版，是他这些年研究成果的阶段性的总结。本书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发展和反经济周期实践，将实证分析、层次性因素分析、特殊影响因素分析和国际比较与绩效分析等相结合，构建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认识和研讨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与操作机制，力求理清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战略抉择。

应当说，近 10 多年来，中国的反周期实践已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理论发展却仍感相对滞后，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下的经济转型问题，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不曾经历过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内的社会制度变迁，在制度运作机制、政策效应的发挥和具体政策的形成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别，不可能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已有理论成果中找到现成答案；另外，经济周期的发生不仅有某一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原因，已全面开放加入国际竞争和全球化潮流的中国，还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文化的；可能是单一的因素作用，更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矛盾，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以上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谨慎借鉴西方既有成果和理论，深入研究相关的学科知识，努力掌握多种经济分析方法，作出具体而深化的考察和认识，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蒙志鹏同志的努力，是顺应这种社会需要的。研究中国转型期的反经济周期理论，既是对转型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完善，也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的丰富和完善添加浓墨重彩的亮色。

希望本书对将经济社会转型与反经济周期相结合的研究，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推动、促使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和理论成果，为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健康发展和现代化事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我们的贡献。

索康

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

序 二

自资本成为主导的经济关系，经济周期就一直伴随着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与此同时，反经济周期的努力也就成了各国政府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活动。中国经济“转型”，纳入世界性的“市场经济”运行，自然也避不开经济周期，也不得不进行反经济周期的努力。

今天的世界正经历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经济危机，其涉及的国家和人口，其造成的损害，都是一九二九年危机所不可比拟的。这对于刚步入“转型”期的中国既是严峻考验，也是一个难得的体验世界经济周期，历练反周期能力，建立反周期机制的机遇。如果说一九二九年大危机时中国因还以农业为主，而且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不仅落后，又很少与世界交往，因此所受影响只在局部，那么八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危机及其体现的周期，不仅是外部的影响，也是我们经济体制和结构，乃至运行机制和管理的内在问题。反经济周期，或者说是避免、应对经济危机已成为中国政界和经济学界所必须探讨的综合课题。

经济危机及其体现的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本性，在于由资本关系主导的经济制度。资本是要营利的，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但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所购买的资源，所控制的技术，

不仅是有限的，也是不均衡的。因此，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并进行生产经营时，就包含着风险，孕育着矛盾和危机。资本的扩张性和控制力、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等各种矛盾，势必归结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进而体现于货币、金融体系，使经济过程呈现周期性。二百余年来，大体十年一个周期，萧条、复苏、繁荣、衰退，首尾相勾连，呈波浪状，有时波动小些，有时波动大些。每次周期，都会在繁荣时促进生产力增长，又都会在衰退时造成大量失业并毁坏生产力和资源。进三步退两步，甚至进三步退三步、四步，虽然大趋势还是增长，但也使人类陷入周期性的困惑与危难。

凯恩斯是第一个系统从事反经济周期研究的经济学家，其动因是一九二九年大危机对资本制度从根本上的震动。这场危机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制的批判，验证了希法亭和列宁对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的论证。罗斯福的“新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的经济模式给凯恩斯以启迪，他发起了对斯密以来正统派的“革命”：将国家的职能从“保安”（或“守夜人”）变成经济的主导和调控者，在坚持资本制的前提下，使自由竞争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用“看得见的手”操起由财政、货币构成的政治“熨斗”，试图熨平经济周期之波动曲折。此举挽救了资本制，延迟了列宁所预言的资本制因腐朽而灭亡的时限。也正由此开始，反经济周期成为正统经济学家们的重大课题。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经济周期与反经济周期成了世界经济的主旋律。虽然前苏联和中国等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一度超然于经济周期之外，但其体制上的弊端又因不能及时正确地改革，引发了“短缺”，最终在大资本财团的胁迫下与世界性的资本经济“接轨”，转型为“市场经济”。

也正因为这种“转型”，中国经济运行也就“接轨”于世界性的经济周期，反周期的研究势必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界、企业界

的重要内容。志鹏对此早有认知，从读硕士开始，就专注此题研究，博士学习期间继续，并做了一篇被评委老师们高度赞评的论文。博士后再深入探讨，成就此书。

中国的反经济周期，当然要考虑世界经济周期和反周期的一般性，但正如志鹏所强调，必须注意中国的国情，充分调动中国的内在要素，以克制引发经济危机的各种条件。这主要包括制度、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经济管理、对外交往五个层次，也就是中国经济大系统整体之力。

经济周期本是经济系统矛盾的集合，反经济周期也必须从经济矛盾系统综合进行。西方国家的反经济周期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因还在其根本——资本制度上。中国的反经济周期，要彻底解决经济周期导致的危机，根本是我们仍在法理上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不是固守传统的“苏联模式”，而是在民主原则导引下经改革所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只有立足于这个根本，在制度改革进程中，不断改革体制、调整结构、优化运行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和政府管理、理顺对外经济关系，才能摆脱资本制度所伴生的经济周期。在这些层次上有许多事情可作可为。而财政和货币的政策，也是反周期的必要手段，但必须与以上各层次相统一，切莫任意使用，以免造成体制和结构上的伤害，避免后遗症。经过这次经济大危机的磨难，中国的经济学界应该逐步成熟，并形成以中国为主体，坚持主义和主权的反经济周期的理论。但愿志鹏此书对中国反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树，能够有所贡献。

劉永信

二〇〇九年五月一日

序三

当蒙志鹏把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送给我，提出让我作序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蒙志鹏曾经是我的学生，十多年的交往使我和他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我生活在北京，他工作在外地，尽管相隔千山万水，但相互交往很频繁，除了不时地通电话外，还差不多每年有一两次见面的机会。每次见面都有深入交谈，谈工作、谈人生，当然也谈学问，谈正在研究的问题。

蒙志鹏是一个爱学习、勤思考、喜欢研究问题的人。1998 年从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毕业后的十年间，他不仅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而走上领导岗位，而且克服种种困难读完了博士、博士后。《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作为他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集中反映了他近年来思考和研究的成果。

在蒙志鹏跟我读硕士的时候，“反经济周期”就是他研究的重点问题，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仍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保持持续兴趣实属难得。攻读博士期间的学习，拓展了他对反经济周期问题研究的视野，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新的研究。连续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使他积累了很多心得，发表了若干成

果。可以说,《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厚积薄发之作、倾心之作。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反经济周期历来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就是在波动中前行,为了降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损失,需要政府适时采取有效措施“熨平”经济周期。应当说,自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期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以来,西方国家在反经济周期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理论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反经济周期却是一个新的课题。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经济体制“转型”条件下经济周期的规律性和特点是什么?在转型期反经济周期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绩效如何评估?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反周期战略和措施?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这项研究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反经济周期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破解这些问题,形成科学认识,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是一个颇具难度的选题。其复杂性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周期不仅受经济因素影响,而且受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仅受一些常规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受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政府反经济周期战略策略的选择及其实际效果,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对经济周期孕育、发生、发展规律性认知程度的制约,而且受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取决于各种政策的选择,而且取决于政策出台时机和力度的选择。所以,尽管转型期反经济周期问题非常重要,但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尚未形成科学而系统的理论,甚至一直没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蒙志鹏的研究报告,在很好地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的特有属性的基础上,对反经济周期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既有对中外已

有成果的梳理，又有对最新实践的分析，呈现出诸多新的探索性成果，初步构建了我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框架。

对反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非此不能揭示反经济周期的机理，但一般性理论分析必须落脚于实际操作性，非此研究的实践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显然，蒙志鹏关于反经济周期研究的视角并非是纯学术的，而是紧密联系实际，从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实践出发，注重可操作性的，体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这一特殊规定性，决定了我国反经济周期的战略策略必然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因之，中国反经济周期需要借鉴西方经验，但不可盲目套用西方的理论，甚至不可盲目照搬西方国家某些成功的做法，否则会导致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基于此，《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提出了我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目标选择和操作框架，其“中国特色”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结合经济周期的动态表现展开分析。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世界主要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拖入下行或衰退的困境。如何从反经济周期研究的视角，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看待和分析这一现象，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无疑是一种挑战。作者显然没有回避这一挑战，及时把“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反经济周期”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从转型期供求关系转换的角度总结了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体现了作者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前瞻性及对经济发展趋势的预判能力和一名一线政策实践者对中国经济关切的良苦用心，大大增强了整个研究的现实针对性。

转型期反经济周期的复杂性，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完善的反经济周期的体制机制，决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

的短暂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在较长时间内艰难探索的过程。一个经济体如同一辆在路上行驶的汽车，宏观层面的反经济周期目标和政策取向决定着“汽车”的行驶方向、速度以及平稳状态；路况决定了经济体的运行环境；车况的好坏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而反经济周期各种措施的选择与运用，如同对汽车的日常保养与维护一样，需要做大量繁琐而细致的工作。不同的是，汽车的维护可以在静止状态下进行，而反经济周期却只能在动态中推进。“反经济周期”的确是一个充满诸多未知因素、需要从多方面探讨的重要课题。所以我说，蒙志鹏关于中国转型期反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整个研究仍然是初步的，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二〇〇九年五月三日